

## 慈善捐贈、私人資本與大學發展研究

◎ 王成軍

捐贈，又稱「慈善捐贈」，是個人或組織將擁有處置權或所有權的財物交與他者使用或擁有。捐贈行為是一種慈善行為，在道德評價體系中是被視為高尚的、值得彰揚的行為（李朝，2004）。一方面，毋庸置疑，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現實存在的捐贈大多是無私的、無償的，甚至是無名的（匿名或隱名）；捐贈的動機源自人的互助友愛的本性。從這個層面上說，捐贈與利益（好處）「風馬牛不相及」也；另一方面，捐贈又與廣義上的「利益」緊密相連的，這兒「利益」所包含的層面相當廣泛，既可以是物質的、有形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無形的；既可以是「短平快」的利益，也可以是長遠的、深刻的、內蘊式的影響。實際上，在某種更廣泛意義上來說，捐贈是一種以較小風險贏得集優股的社會性事業積極融資。

從組織構成來看，現代社會的社會組織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它們分別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主要組織形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塞拉蒙教授認為，非營利組織應該具有六個基本特徵：一是「正規性」，即非營利組織必須具有正式註冊的合法身份；二是「民間性」，即非營利組織應從組織機構上與政府分離；三是「非營利性」，即非營利組織不得為其擁有者謀求利潤；四是「自治性」，即非營利組織要能控制自己的活動；五是「志願性」，即在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和管理中均有顯著的志願參與成份；六是「公益性」，即非營利組織要服務於某些公共目的和為公眾奉獻（徐永光，2004）。加州大學前校長克拉克·克爾作過一個統計：1520年之前全世界創辦的組織中，現在仍然用同樣的名字、以同樣的方式、幹著同樣的事情的，只剩下來的八十五個全為非營利組織，其中七十個是大學，另外十五個是宗教團體（張維迎，2004：10）。不難得出，長遠了看，總體而言，非營利組織的生命力頑強於政府組織和營利性組織。

這裏研究的捐贈，便是非營利組織的一類主要活動，以及企業等營利性組織通過非營利性組織或其個體直接參與的諸如成立基金會、捐助「希望工程」等一類慈善型公益活動。同時此外，非營利組織的主要活動還包括學術研究、行業管理、國際交流、社區管理、中介機構、公民互助等等。近二十年來，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社會團體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僅正式登記的社團就從六千多個增加到二十多萬個，增加了三十三倍。諸如慈善捐贈個人、團體或組織等這些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是以「合作」而非「對抗」，對於「政府失靈」以及「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缺遺與不足構成了必要的緩和與補充。

### 一 對捐贈現象的歷史考察

從歷史上看，在中世紀及中世紀後期，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後特徵（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於救濟孤兒、施捨醫藥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於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 1996；秦暉，2004）。活動局限於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

同體的束縛——保護關係中，施捨者與被施捨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十六世紀都靈地區「慈善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樑。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於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於對教會盡義務，並無「志願」性質。

在荷蘭，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十八世紀後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關係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 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藥房在十八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援，當時在約克、里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十九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於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 1991: 149-169）。十九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後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願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Barry and Jones, 1991: 172-186）。

在美國拓荒時代，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傑明·佛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組織之一「佛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佛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一般的說，基金會是向社會籌措資金以興辦、維持或發展某項福利事業的社會組織。但到了戰後的1962年，隨著第三部門與公益事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作為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並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標的「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並成為志願捐助信託基金的通行準則。基於此，佛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近似原則」下把最初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於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於支持開辦佛蘭克林學院（Weaver, 1967: 21-22；秦暉，2004）。

其後，隨著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進一步發展，由大筆私人遺產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來自宗教的慈善基金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 1995: 12, 19；秦暉，2004）。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興起，濟貧施藥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徵。十九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託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捨，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二十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八成來自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佔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 1967: 62-65）。

## 二 捐贈與美國私立大學成長

就世界範圍內來看，很多一流大學都在美國，而美國的很多大學都是私立的，同時這些私立的大學又大抵多是靠私人資本慈善捐助發跡的。下面筆者在參照前輩人研究的情況下，不揣譎漏有意就這一美國社

會趣味現象進一步作一番對比分析考量。

### （一）哈佛捐贈遺風

1633年，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清教牧師約翰·艾略特（J. Eliot）致信麻塞諸塞當局，力陳在麻塞諸塞灣建立一所學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1636年10月28日，麻塞諸塞議會正式通過議案，決定建立一所學院（郭健，2000）。按當時官方原始記載：「議會同意撥款四百英鎊開辦一所學院。明年先支付二百英鎊，待工作就緒後，支付另外二百英鎊。下次議會開會期間，決定設校址和校舍建築風格。」於是，這一天哈佛誕生，也便是美國高等教育誕生，而美裏堅合眾國於1776年7月4日才正式成立。故也從此有「先有哈佛，後有美國」（朱學勤，1999；孫玉紅，2003）之說。

「劍橋學院」附近有一查理小鎮上居住著一位名字叫作哈佛（J. Harvard）的年輕清教牧師。他畢業於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1637年抵達麻塞諸塞。不幸的是，哈佛到了北美不久便染上肺病，於1638年9月14日去世。按遺囑，他的一半財產<sup>1</sup>共計719鎊17先令2便士和約400冊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劍橋學院」。這筆捐款幾乎相當於麻塞諸塞議會撥款的兩倍。為紀念哈佛先生的慷慨義舉，麻塞諸塞議會遂於1639年3月3日將學院更名為「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從此，這一捐資助學之風，不僅成為哈佛學院的傳統，而且潛移默化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傳統（郭健，2000：9）。

### （二）霍布金斯大學的誕生

大九世紀早期，在美國東部鮑爾梯瑪城有一大富翁霍布金斯，他自幼家窮，後隨母讀書後去城內做買賣，因賺錢而開了一家公司，未幾十年就當了財主。他在七十歲時立一遺囑，要將所有遺產350萬美金分給一醫學院和大學作基金。1873年，他七十九歲時逝世，他的遺囑生了效。翌年，即開始創辦大學，當時董事會請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W. Eliot）、康奈爾大學校長懷特和密執安大學校長安其爾來研究。那時如此鉅款辦大學，真是一件空前的事。那時該校董事長的意思是要辦一所「大學」，可是請來的這三位校長卻勸他們要顧及環境，說甚麼南方不如北方文化高啦，辦大學不是從空氣裏能生長的等語。後來，董事會請他們三人推選校長，三人卻不約而同的選出了吉爾曼來當校長，他發表了他的見解說，應全力提倡高等學術，致力於提倡研究考據，把本科四年功課讓給別的學校教，我們來辦研究院，我們要選科學界最高人才，給他們最高待遇，然後嚴格選取好學生，使他們發展到學術最高地步，每年督促研究生報告研究成績，並給予出版發表機會。因為那時高水準的教授們，都在教學院的學識淺近的學生，或受書店委託編淺顯的教科書，如果給他們安定的生活，最高的待遇，便可以專心從事更高深的研究（姜義華，1998）。

這樣也便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學——霍布金斯大學，它深受德國大學的影響，不論是建築經費，還是管理經費，都只是佔大學開支的極小部分。校長吉爾曼極力將充足的資金用於人才，而不是蓋樓和建設校園。早期的霍布金斯大學甚至連個足球場和籃球場也沒有，然而卻有大量的供研究專用的設備，學校看上去更像工廠或大商店而不像大學（賀國慶，1998：206）。以至於有一位來訪者嘗言：「他們有無數真正的研究，卻沒有一個可以醒目顯示的中心。」更值得一提的是，霍布金斯大學自辦學之初就創辦科學刊物，這可謂美國發表科學刊物之創始。1876年，出版算學雜誌，1880年創刊語言學雜誌，以及歷史政治學雜誌、邏輯學雜誌、醫學雜誌等八大雜誌，從而開一代研究時新風尚。

### （三）斯坦福大學奇跡

一個多世紀以前，當時斯坦福家族想把一億多美元的天文數字的捐款贈給哈佛大學，條件是要求哈佛大

學改名為斯坦福大學，或者至少要把斯坦福掛在哈佛的名字後面。哈佛大學董事會則認為，世界上「先有哈佛，後有美國」，豈能讓別人隨便改名呢？然後未果，斯坦福一怒之下說道，你不讓要我這個錢，那我到美國西海岸去辦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競爭，於是就有了斯坦福大學（丁學良，2001）。

同一時期，在1876年，加州前州長老利蘭·斯坦福捐出了其八千多英畝的原本專供培育良馬的帕羅阿圖農場，決定創辦一所完全不同於東部常春藤聯盟的大學，即一個沒有宗教派系之爭、注重實用技術、培育有教養的合格公民的大學。在經過五年的精心策劃和籌備後，一所融合了美國特有的崇尚個人奮鬥、平等、務實的西部精神的現代大學，即在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學，全稱小利蘭·斯坦福大學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正式創辦了（亦可清心，2002）。首任校長喬丹向師生和來賓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說：「我們的大學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所，但她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憑著這個繼承權，就不愁沒有迅猛而茁壯的成長」。他宣布：「我們師生在這第一學年的任務，是為一所將與人類文明共存的學校奠定基礎。這所學校決不會因襲任何傳統，無論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標全部是指向前方的」。

1920年斯坦福大學還只是一所「鄉村大學」，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評為全美大學的第一名。斯坦福大學的崛起為矽谷微電子工業創造了條件，同時，矽谷的發展也幫助了斯坦福大學，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斯坦福大學與矽谷彼此的發展之所以能聯繫起來，一方面是時代發展與演進所提供的機遇；另一方面一些個人或集團的主觀創造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回顧斯坦福大學與矽谷相得益彰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關注連接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的橋樑——斯坦福研究園區。

斯坦福研究園區是由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於1951年創建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園區，被譽為「研究園區之父」。基於招攬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學術尖端」構想，特曼教授和當時的校長華萊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決定把斯坦福的土地變成金錢，而把錢——通過聘請著名教授——變成了學術上的威望。他們的辦法就是如此簡單，出租土地為學校掙錢。在原來老斯坦福的贈予書內，寫明瞭這些饋贈的土地（斯坦福校區）不許出售，但沒有禁止出租。所以，他們就劃出7.5%的校園土地，約655英畝，出租給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工廠，這便是斯坦福工業園區，即後來發展成為矽谷。

毋庸置疑，矽谷的崛起，為斯坦福帶來的直接回報便是金錢，但最大的回報恐怕還是遠遠不斷的智力資源和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房地產方面，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斯坦福每年僅從工業園區的土地租賃中就坐收600萬美元；專利出賣所得方面，從1970年至1998年，其收入已達3億美元；最為重要的校友捐贈方面，1977年惠普公司的休利特和帕卡德兩人就捐助了920萬美元為斯坦福建立了特曼工程中心，而在1991年甘迺迪校長任上，斯坦福一舉創造了校慶募捐12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在整個高等教育史上也是一件極為不可思議的事，讓豪華世家哈佛也望塵莫及。也就是這個「另類」的大學，集結了十七位諾貝爾獎、四位普利策獎、220位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會員和128位國家科學學會會員的強大陣容，可謂最具美國色彩的研究型大學（閻光才，2003）。故而，人們又把它視為大學之中美國精神的一面旗幟或美國美夢成真的典範之作。

#### （四）克拉克大學與芝加哥大學人才之爭

克拉克大學是美國第一所完全是研究生院的大學，1889年由百萬富翁克拉克（J.G. Clark）捐資創辦於麻塞諸塞州的烏斯特。它主要是借鑒和吸納德國大學模式，並深受美國建國一百周年誕生的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學——霍布金斯大學影響。辦學先期，校長霍爾親赴歐洲考察學習，並以此延攬了一大批的德、法、荷、英等國著名大派教授、高水準學者（賀國慶，1998）。然而不久，霍爾與捐資人克拉克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後者認為霍爾對於研究生水準的科學研究過於強調，應該與對本科有效教學給予同等關心。這樣內部的分歧，又加之克拉克搖擺不定的資金政策，終於給了芝加哥大學一可乘之機，挖走了

克拉克大學諸多的卓越的教師。

芝加哥大學是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捐款二百萬美元創建的。校長哈珀上任一開始便尋思籠絡優秀人才，當他得知克拉克大學許多教員因不滿捐款人的資金政策而人心惶惶之時，及時拽住了這一天賜良機，悄悄的到烏斯特作了一次旅行。在霍爾校長蒙在鼓裏的情況下，他會見了大批教師，允諾芝加哥大學付給他們的薪水將比他們在克拉克大學目前收入提高近一倍。在優厚待遇引誘蠱惑下，許多教師欣然前往。雖然霍爾知道後大發雷霆，但為時已晚。他無不傷心的說：「克拉克大學成了牧馬場的作用，因為我們的大多數教員完全被傾巢而出、移植到一塊具有充裕資金的土壤了。」（Westmeyer, 1985）

由此，克拉克大學則近於一蹶不振了，在後來的美國大學發展中名氣甚微、不見經傳，而芝加哥大學卻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其重金聘請的來自克拉克大學內外的諸多教師，加上其「研究工作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提供教學；教師晉升的依據主要是科研而非教學」的基本政策極大的推動了芝加哥大學的成長。其大學的榮譽是它的研究生和專業學科，出版社和科學期刊更是享譽歐美。在開辦四年後，其學生總數已超過一千人，來源分布於美國乃至全球各地，比當時的哈佛學生數還要多，學校也日益成為舉世公認的高級學術研究中心。DeVane（1965）認為：芝加哥大學在美國大學思想的發展中接過了霍布金斯大學的接力棒。如果說霍布金斯大學是大學運動的先驅，那麼芝加哥則是大學思想成熟的具體體現，是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的榜樣和楷模之作。

#### （五）美國大學接受捐贈的新近情況

據非盈利性機構美國教育資助理事會的最新資料，以2001年資料來看，按當年度淨收入計，得到當年度捐贈最多的前15所大學如表1所示。

表1：2001年全美得到捐贈最多的前五所大學

名次	大學名稱	總收入（億美元）	接受捐贈（億美元）
1	哈佛大學	45.65	6.83
2	斯坦福大學	28.45	4.68
3	哥倫比亞大學	22.82	3.58
4	耶魯大學	29.73	3.50
5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22.82	3.47
6	康耐爾大學	17.55	3.09
7	印第安那大學體系	未知	3.00
8	艾摩利大學	14.89	2.97
9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校園）	18.45	2.92
10	賓西法尼亞大學	27.76	2.85
11	南加州大學	18.70	2.8
12	加州大學（聖佛郎西斯校園）	未知	2.71
13	杜克大學	31.16	2.64
14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園）	未知	2.63
15	華盛頓大學	未知	2.31

資料來源：華盛頓觀察（周刊），2002年第10期。另外：其他著名學府2001年所籌集到的資助包括密歇根大學的私人資助2.18億美元，加州伯克利大學所獲私人資助2.02億美元；麻省理工學院按淨收入只排名第二十一，但總進帳為25.65億美元，私人資助為1.99億美元；普林斯頓大學按淨收入排名第二十三，總進帳為14.70億美元，私人資助為1.84億美元。

### 三 西方社會中捐贈的現代觀念、規制與行動

在考察捐贈這一現象時，有人將其歸結於西方社會崇尚慈善捐贈、贖回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這樣的解釋雖然不無道理，但或許從二十世紀西方的稅法中去尋找答案會更確切些。美國法律規定，捐贈的財富不在徵收遺產稅的範圍之內，而且捐贈金額的二分之一可以用於沖抵遺產稅。高額、嚴格的遺產稅，最多使富人的遺產惠及一代人，而到了第三代，已所剩無幾。中國古人所雲的「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和老百姓所言的「富不過三代」，在西方不少國家竟演變成了一種制度。此外，西方一些國家的個人收入調節稅，已使不少人月收入中的50%以上納入國庫。有的國家還這樣勸導富人來納稅：你們來納稅，政府就有錢；政府有了錢，就可以救濟窮人；窮人有了錢，社會就太平無事。如果你們不納稅，政府就沒有錢；政府沒有錢，就不能救濟窮人；窮人沒有錢，就要殺人越貨；殺誰呢？首先殺你們這些有錢的。所以，答案是：你們要納稅保平安（郝鐵川，2003）。

鄧小平曾經說過，有了一個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壞人無法做壞事；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好人不僅無法做好事，有時還會變壞。這句話樸素直白，準確地揭示了制度的功能。借著這段話，我們還可以再引申出一句：一個好的制度，有時還可以使「壞」人變好人，或者說可以使人做好事。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富人們流行用捐款來建設博物館、音樂廳和大學。如今，美國人在捐贈時更關注其他的問題，更關注自己捐贈的金錢的用途。「新一代的捐贈人更加關注人類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衛生和教育。」雖然美國經濟面臨衰退，但是2002年度中美國人為慈善事業的捐款仍達到了240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去年美國前五十項數額最大的個人慈善捐款中，有十項就來自遺產捐贈。捐贈物件也出現了全球化趨勢，捐贈人開始關注如何幫助全世界的貧困國家解決它們的問題（廣西柳州市慈善會，2003）。

沃爾特·休伯特·安嫩伯格，這位三角出版公司的總裁，生前擁有一個巨大的媒體帝國。2002年10月1日去世時，他擁有的個人財產估計價值四十億美元。這筆巨大的財富給了誰？在安嫩伯格的遺囑中，他將自己投資的一半都捐贈給了慈善機構，用於大學研究以及兒童教育。為甚麼不將遺產留給家人？安嫩伯格在遺囑中解釋說，他的家人已經生活得很好了，而「財富不應該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安嫩伯格應該是美國富人處理自己遺產最新、最典型的代表：將自己所有的財產，或者說幾乎所有的財產，捐贈給社會公益事業。根據《商業周刊》公布的2003年慈善家排行榜，排名前三位的慈善家和主要捐贈方向分別為：比爾·蓋茨、梅琳達·蓋茨夫婦主要資助衛生、教育事業；英代爾公司創始人之一戈登·莫爾、貝蒂·莫爾主要資助自然資源保護和教育；投資商索羅斯主要資助建立開放與自由社會（搜狐財經，2004a）。比爾·蓋茨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擁有大約407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以前曾被巴菲特批評為吝嗇鬼，然而至今他已為慈善事業捐贈了256億美元。最近比爾·蓋茨向外界公布了遺囑，其中宣布將把全部財產的98%留給自己創辦的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個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將負責把這筆錢用於研究愛滋病和瘧疾的疫苗，並為世界貧窮國家抵禦這兩種疾病提供援助。在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國銀行家沃倫·巴菲特也將他的大部分財富留給社會公益事業。在他的遺囑中，他將總價值約305億美元的個人財產的99%捐贈給了慈善事業。同比爾·蓋茨一樣，巴菲特也指定了遺產的用途：用於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

### 四 中國大陸地區捐贈情況分析

這裏，不妨以2004年中國大陸地區企業慈善捐贈為例著手進行分析和處理。

## (一) 捐贈排行榜

歐洲貨幣（中國）與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在2004年5月10日，正式共同發布了《2004中國大陸企業慈善家捐贈排行榜》，這是內地首個此類榜單（表2）。

表2：2004中國大陸企業慈善家捐贈情況（前五十位）

排序	姓名	公司	2003年 捐獻額	捐贈方向	公司 總部	行業	出生地	年齡
1	黃如論	金源房地產	211,200,000	高等教育、健康	北京	房地產，建材	福建	53
2	張芝庭	神奇集團	128,000,000	健康	貴州	醫藥，投資，房地產，酒店	河南	60
3	李金元	天獅集團	66,400,000	健康、教育	天津	醫藥，保健品	河北	46
4	余彭年	彭年事業	61,800,000	健康、高等教育	廣東	酒店，投資	湖南	82
5	陳一丁	天網軟體	44,500,000	健康	陝西	軟體	湖南	37
6	楊瀾	陽光文化網路 電視	38,300,000	教育、文化事業	上海	媒體	北京	36
7	陳偉峰	瀛通集團	34,500,000	社會公益事業、健康	上海	上海房地產	上海	43
8	朱孟依	合生創展	30,000,000	教育	廣東	廣東房地產	廣東	45
9	陳偉東	萬基藥業	25,000,000	健康	廣東	保健品，醫藥	廣東	41
10	宗慶後	娃哈哈集團	22,100,000	健康、教育、文化事業	浙江	軟飲料，童裝	浙江	59
11	南存輝	正泰集團	20,800,000	扶貧	浙江	工業電器設備	浙江	41
12	吳一堅	金花集團	20,000,000	健康、教育	陝西	保健品，西安房地產	陝西	44
12	張思民	海王集團	20,000,000	健康、教育	廣東	保健品	吉林	42
14	劉志強、 翟美卿夫婦	香江集團，金 海馬集團	19,000,000	教育、健康	廣東	傢俱零售，房地產	廣東	40、 40
15	許榮茂	世茂集團	15,600,000	文化事業、教育、健康	上海	香港，北京，上海和福建的房地產	福建	54
16	樓忠福	廣廈集團	15,000,000	社會公益事業	浙江	浙江，上海，重慶房地產，建築	浙江	50
17	郭廣昌、 梁信軍	複星集團	14,000,000	高等教育	上海	上海房地產，醫藥，零售	浙江	37、 36
17	李春元及 其家族	海鑫鋼鐵	14,000,000	助殘，社會公益事業	山西	鋼材製品	山西	72
17	林聖雄	浙江聖雄集團	14,000,000	教育	浙江	基建	浙江	38
20	尹明善	力帆集團	11,800,000	教育、健康	重慶	發動機，摩托車	重慶	66
21	李興浩	志高空調	11,300,000	社會福利、教育、健康	廣東	空調	廣東	50
22	王均瑤	均瑤集團	11,200,000	教育，健康，助殘	浙江	房地產，航空，乳業，酒店	浙江	37
22	王永輝	廣州香雪制藥	11,200,000	健康	廣東	保健品	廣東	40
24	楊卓舒	卓達集團	11,100,000	教育、健康	河北	石家莊房地產，	黑龍江	52

					教育			
25	張躍	遠大空調集團	10,900,000	教育、健康、文化事業	北京	中央空調	湖南	44
26	錢金波	紅蜻蜓集團	10,100,000	教育	浙江	制鞋，零售	浙江	40
27	陳天橋	盛大網路	10,000,000	教育	上海	網路遊戲	浙江	31
27	蔣敏德	杭州未來食品	10,000,000	教育	浙江	嬰兒米粉	浙江	58
27	薛永新	恩威集團	10,000,000	健康	四川	婦女衛生用品	四川	52
30	吳良定	中寶集團	9,300,000	教育、社會福利	浙江	鋁制輪胎和機械	浙江	58
31	修涑貴	吉林修正藥業集團	9,200,000	健康	吉林	醫藥	吉林	50
32	張榮坤	福禧投資控股	9,000,000	社會公益事業	上海	基建，投資	江蘇	36
33	朱張金	浙江卡森實業	6,200,000	教育	浙江	皮革（汽車用）	浙江	39
34	鐘睽睽	海南養生堂	6,000,000	健康	浙江	保健品	浙江	48
35	曹德旺	福耀集團	5,400,000	教育、社會福利	福建	汽車擋風玻璃	上海	58
35	花欣	邁普產業集團	5,400,000	高等教育	四川	通訊設備	四川	47
37	李勤夫	茉織華集團	5,100,000	社會公益事業	上海	服裝，印刷	浙江	42
38	魯冠球及其家族	萬向集團	5,000,000	健康、社會公益事業	浙江	汽車配件	浙江	59
38	楊文瑛	上海晨興電子科技	5,000,000	教育	上海	電子元件	上海	61
38	翟韶均	江蘇力聯集團	5,000,000	健康	江蘇	房地產，基建	江蘇	43
38	周小弟	周氏集團	5,000,000	健康	上海	房地產，教育	上海	49
42	陳立群	百萬莊園	4,200,000	健康	北京	房地產，食品加工	北京	48
43	張春來	唐山曙光集團	4,100,000	健康	河北	建材	河北	52
44	梁慶德	格蘭仕集團	4,000,000	健康、教育	廣東	微波爐	廣東	67
45	齊濟	柯瑞生物工程	3,600,000	健康	北京	生物工程	北京	48
46	趙建國	北京集美傢俱城	3,500,000	健康、教育	北京	傢俱零售	河北	52
47	祝義才	雨潤集團	3,300,000	健康	江蘇	肉製品，房地產	安徽	40
48	徐明	實德集團	3,200,000	教育、社會公益	遼寧	化工建材，足球俱樂部	遼寧	33
49	嚴曉群	斯威特集團	3,000,000	健康	江蘇	IT業，投資	江蘇	38
49	朱保國	深圳太太藥業	3,000,000	健康	廣東	保健美容品	河南	43

資料來源：企業公民委員會，2004

## （二）捐贈榜單分析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捐贈領域很寬泛，包括純粹利他性的捐贈，也包括互利性的贊助。一般的說，只將福利、教育、醫療、環境四個領域的利他性捐贈納入統計範圍，但考慮到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在初級階段，這裏放寬了統計標準，以鼓勵更多的慈善意識和公益行為，故而將互利性的贊助行為也納入了統計範圍。

從表2中不難得出，榜上五十位慈善家2003年度總共捐贈了10.2億元的現金和物資，其中教育和健康是最主要的兩個最主要的捐贈方向（搜狐財經，2004a），分別有二十八和三十二家。因為非典的緣故，2003



年的慈善事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健康方面的捐贈達到了一個高潮。慈善榜榜首的黃如論先生，僅為非典就慷慨捐資1400萬元。一些制藥企業和醫療相關企業也在非典期間踴躍捐贈，既盡了社會責任，也有效地樹立了企業的良好形象。

散財和聚財一樣，需要智慧和才能。新一代慈善家像經營企業那樣認真地對待他們的捐贈，要求資金使用得有效、透明、看得見結果。企業家對捐助教育特別熱心，聖雄集團董事長林聖雄是內地目前捐助「希望工程」最多的個人。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業家還都捐款設立了專門的教育基金，像娃哈哈—浙大宗慶後研究生科研創新專案基金等。表2還顯示，排在第一位的北京金源房地產的黃如論、排在第四位的廣東彭年事業的余彭年、排在第十七位的上海複星集團的郭廣昌、梁信軍以及排在第三十五位的邁普產業集團的花欣均已把其捐贈款項投放於高等教育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恰表明了實業界人士的遠見卓識以及智慧民間性。同時，這也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進程以及高等教育多元化、多樣性發展帶來了新的課題與機遇、契機與挑戰，包括在實際運作中的探索、稅收政策的協調乃至學術界的思考關注等層面。

## 五 一個經典的中國大學捐贈案例——「寧波幫」與寧波大學

「寧波幫」，是寧波尤其是寧波商人在開展商事活動中逐步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一種群體稱謂，泛指舊寧波府屬的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個縣在外地的商人、企業家及旅居外地的寧波人（夏炳章，2003）。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商人都湧向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經商，形成了商幫，當時較著名的商幫有「廣幫」、「徽幫」、「閩幫」等，但有些商幫逐步衰落，銷聲匿跡，而「寧波幫」曆久不衰，不斷發展、壯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寧波幫」企業家，更是舉世聞名。

崛起於東海之濱的寧波大學，在短短的十七年中，超常規發展，走過了國內一般高校需要幾十年才完成的歷程，讓人驚歎，引人矚目。包氏教學樓群、邵逸夫圖書館、林杏琴會堂、黃陳月莉行政樓、曹光彪科技樓、曹光彪資訊樓、包玉剛圖書館、包玉剛體育中心、逸夫教學樓、逸夫職教樓、龍賽理科樓、李達三外語樓、湯於翰醫療中心、應虞房醫療中心、思禹建工樓、繡山工程樓、魏紹相館、杏琴苑、錦繡學生活動中心、宗瑞航海樓、李興貴球場……這一幢幢用海外「寧波幫」名字命名的教學樓、學生樓、實驗樓等，都能讓人觸摸到一顆顆「寧波幫」愛國愛鄉的赤子之心，都內在暗含了一個個生動激情的故事。

然而，在1984年，寧波被列入沿海開放城市和計畫單列市，其時，寧波一缺資金，二缺人才。考慮到寧波有人口500萬，地域一萬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十倍，竟沒有一所大學，而香港550萬人口，卻有四所大學。1985年10月29日，船王包玉剛出於鄉梓深情決定捐資2000萬美元，籌建佔地1283畝的寧波大學。1991年9月23日，包玉剛先生不幸溘然長逝後，包玉剛的四個女兒於1992年向學校捐贈了500萬元人民幣，作為「獎教金」以穩定師資隊伍。面對這份沉甸甸的「獎教金」，寧波大學全體教師表示暫時放棄提高自己的福利，先從這500萬元「獎教金」中擠出380萬元用於建造五號教學樓。也因此，寧波市政府決定今後按捐資者所捐款額一比一的比例由市財政撥款支援學校建設。

隨後，由香港榮華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安中領銜首要的「寧波幫」，開創了捐建寧大的浪尖高潮，主要有：香港「毛紡大王」、港龍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會名譽主席曹光彪，香港安泰集團主席黃慶苗，泰昌祥輪船（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顧國華，香港中華醫學會會長湯於翰，香港九龍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包玉剛先生的胞兄包玉書，著名實業家、香港中華總商會當然永遠榮譽會長王寬誠先生的長媳孫弘斐等僑商知名人士。截止到2003年底為止，有近五十位海外「寧波幫」人士先後捐贈逾2.5億元人民幣（按當年匯率計算）用於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獎學金等各項建設（嚴紅楓，2003）。

同時，考慮到大規模制度變遷、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具備了哈耶克所言的，為避免陷入「致命的自負」或非理性的混亂而「在一切方向上努力」的可能性，這也是國內大學發展運作中所極為罕見的一種哈耶克所提及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或「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引自汪丁丁，2002）的秩序發展模式，華僑私人巨額資金捐贈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對於擺脫狹隘孤立的單部門大一統自戀型沙文主義的辦學模式，探索推助中國大學成長，豐富完善中國高等教育激烈變革以積極蓬勃態勢參與並融入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爭與合作視野範圍內，起到了卓越鮮明的貢獻與可能。而寧大校方所採取的高水準人才引進戰略以及週末藝術電影放映薰陶校園文化、活躍激蕩學術科研氛圍等常識性然卻出乎目前某些自命不凡的大學管理者視界之外的舉措，無疑更催勁拓延了一所好大學的生命力空間。這是基於兩個一般性判斷，一是「大學之道，不在於大樓，而在於大師與大道」，二是沒有好的經典電影放映，就別想著成為甚麼世界一流大學，因為沒有好電影看，你哪來的自由自在的想像力空間，而沒有豐富發達的想像力空間，你的科研靈感與成果從哪裏「熏」得出來？！

## 六 結論——關於財富、捐贈、規範以及制度的探討

返觀國內，相比較而言，中國雖已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引導整體經濟運行由計畫模式向市場模式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所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也當看到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在觀念思路形成與制度體系建設方面還依然稍顯滯後與阻障，修訂後的憲法還有待進一步落實到可操作的具體化層面上。有人按慣性思維對富豪們的「財富品質」提出質疑：《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上榜者不斷「落馬」，比如周正毅金融案、劉曉慶被拘捕審查、楊斌的被監視居住、仰融的「出局」、張思民的「海王生物」接受中國證監會的調查（李衛華，2004）。然而，尤突出問題是產權制度依然沒有明晰界定，這也就使得大量民間閒散資金在國內找不到進一步釋放發揮作用的可能而出現逃逸現象嚴重，另一方面，也看到我國大學在人才培養能力、科學研究水準、服務地方經濟、引導國家需求、參與國際競爭、爭創世界一流等方面尚處於不利不足地位。

正如Naughton等（1995）則認為，經濟改革為中國快速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鋪平了道路，但市場經濟在激發經濟活力的同時只進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而且法制建設落後，缺乏相關的法規，從而產生通貨膨脹，導致腐敗蔓延、資金外逃、社會發展不平衡與地區差距拉大等問題。Goldman和Macfarquhar（1999）也分析指出，官員和企業所有者之間已出現了一種結盟合謀關係，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界限被模糊了。湖北日報評論員（2003）指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審批職能，不能體現市場主體決策、收益、風險對稱原則；其低效率不適應市場競爭和技術快速變化的要求；由於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容易造成「尋租」行為。White等（1996）用「分化與整合」來揭示中國這種社會變動現象，即：一方面強調加強中央領導，另一方面各級領導都存在不得力的問題；一方面強調社會的整合，另一方面卻出現社會多元化趨向。易憲容（2003）認為行政管制阻礙了政府職能的轉變，無助於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這種沒有轉變職能的政府的觸角伸到哪個行業，這些地方的經濟運作無效率或低效率就顯而易見。如金融、電力、民航等行業基本都是如此。楊小凱（2003）則指出，中國至今還存在著三十三個行業的門閥壁壘（threshold）太高，以至於完全稀缺，造成硬性壟斷。因此，經濟改革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不僅對中國的計劃經濟，而且對於政府職能都構成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再者，2003年SARS危機以及2004年禽流感疫情和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警示作用，社會層面上許多問題的凸現彰露不能僅僅全部都要仍然依賴於一個龐大無形的全知全能型的鉗制政府來調停從理，而作為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第三部門（NGO / NPO，非政府、非盈利組織，通稱NGO），近年來在國際上漸有與政府（第一部門）、市場（第二部門）三足鼎立之勢。中國的NGO雖然剛

露苗頭，然而它植根於強大的世界潮流、國際上通行慣例和人們的普遍需要之中，因此創造一切有利於NGO發展的土壤，讓NGO漸漸成為WTO框架容許的範圍內替政府分憂解難，協同增強大學以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推進和完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周陽敏，2003）。

鑒於美國社會慈善捐贈的集聚和擴散效應在美國大學的成長以及美國國力的增強方面發揮著無比迅猛的獨特威力考慮——看似微不足道的慈善捐贈，卻對於美國社會的穩態定型卻起到如此巨大作用，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筆者以為我們政府宜儘早擬定明晰產權制度，起手劃分三部門行動空間，以使私人資本能卓有成效的進一步成長、壯大、釋放、流動、讓渡，從而以期通過稅收調節、投資合作、慈善捐贈等方式管道引導理順資本流向資金稀缺與人力過剩的高等教育領域，探討推助我國私立大學的茁壯成長以最終不斷活躍經濟、繁榮社會、貢獻國家、造福人民。儘管這其中，可能會出現某些諸如個別資本借不正當手段以攫取私利等暫時混亂局面、不確定因素，但這在學習型政府的不同於橫加干涉束縛的宏觀合理規制下，負面因素並不足以影響未來私立大學優良發展態勢的。一旦將這些私人資本以及民間智慧解放煥發出來，中國社會未來前景民生力量不可限量。因此，因噎廢食自是不必要的。

## 參考文獻

- Alvey, N. (1995). *From Chantry to Oxfam: A short History of Charity and Charity Legislation* [M]. London: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Local History.
- Barry, J. and Jones, C. (ed.), 1991. *Medicine and Charity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M]. London: Routledge.
- 蔡騏 孫有中(2000). 現代美國大眾文化 [M]. 中國經濟出版社.
- DeVane, William Clyde(1965), *Higher Educ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2.
- 丁學良(2001). 甚麼是世界一流大學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5):4-9.
- Goldman M & Macfarquhar R(1999).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廣西柳州市慈善會(2004). 億萬遺產不留子女 [EB/OL]. [http://www.gx1zcf.com/html/shownews.asp?news\\_id=146](http://www.gx1zcf.com/html/shownews.asp?news_id=146)
- 郭健(2000). 哈佛大學發展史研究(博士論文) [M]. 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
- 郝鐵川(2003). 億萬遺產何以不留子女 [N]. 檢察日報2003,09,10 .<http://www.jcrb.com/zyw/n2/ca124272.htm>
- 賀國慶(1998). 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導言.
- 湖北日報評論員(2003). 把主導作用還給市場——為甚麼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EB/OL]. <http://www.cnhubei.com/200311/ca368901.htm>
- 姜義華(1998). 胡適學術文集·教育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 李朝全(2004). 利益驅動機制在社會籌資中的運用 [EB/OL]. <http://www.cydf.org/gb/conference/speech/paper-c/9.htm>
- 李衛華(2003) 李海倉遭槍殺 私營企業家生存環境再成熱點 [J]. 電腦世界, 2003,01,24 . [http://www.ccw.com.cn/html/work/News/03\\_1\\_24\\_2.asp](http://www.ccw.com.cn/html/work/News/03_1_24_2.asp)
- Mccants, Anne E.C.(1997). *Civic Charity in a Golden Age: Orphan Care in Early Modern Amsterdam* [M].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 Naughton B., Davis D. S., Kraus R., Perry E. J.(1995).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企業公民委員會(2004). 2004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全部名單). BUSINESS.SOHU.COM 2004年5月10日09:19.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5/10/72/article220067248.shtml>

- 秦暉(2004).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的若干問題 [EB/OL].<http://www.cydf.org/gb/conference/speech/paper-c/15.htm>
- Schneewind, J.B.(ed), 1996. Giving: Western Ideas of Philanthrop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搜狐財經(2004a). 2004中國大陸慈善家捐贈方向:教育和健康[EB/OL]. BUSI- NESS.SOHU.COM.2004,05,08.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5/08/73/article220037394.shtml>
- 搜狐財經(2004b). 2004中國大陸慈善家年齡分布[EB/OL]. BUSINESS.SOHU.COM 2004,05,08.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03/73/article220037332.shtml>
- 孫玉紅(2003). 先有哈佛 後有美國[J]. 南風窗, 2003,01(下):72-73.
- 汪丁丁(2002). 哈耶克「擴展秩序」思想初論[EB/OL]. 2002,11,08. <http://www.tszz.com /theory /liberalism/liberalism0013.html>
- Weaver, W. (1967). U.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M]. New York: Harper & Row.
- Westmeyer(1985).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 1985,P.93.
- 徐永光(2004).中國第三部門的現實處境及我們的任務[EB/OL]. <http://www.cydf.org /gb/conference/speech/paper-c/27.htm>
- White G. ,Howell Jude., Xiaoyuan Shang(1996).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夏炳章(2003). 曆久不衰的「寧波幫」[J]. 人民論壇.<http://student.nbu.edu.cn/articles /shownews.asp? id=1658>.2003,09,19.
- 閻光才(2003). 斯坦福的矽谷與矽谷中的斯坦福[J]. 教育發展研究, 2003(9):87-91.
- 嚴紅楓(2003). 寧波大學與「寧波幫」[N].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12,12.
- 楊小凱(2003). 基督教和憲政[EB/OL].<http://culture.online.sh.cn/bbs/read.asp? boardid=1&bbsid= 10647>.
- 亦可清心(2002). 斯坦福大學發展之路[EB/OL]. 飄渺水雲間:Freecity.dhs.org · [FROM: ego] (Wed Apr 10 09:47:57 2002) 信區: Education
- 易憲容(2003). 政府職能轉變的制度保證[N]. 南方週末,2002,09,06.
- 張維迎(2004). 大學的邏輯[M].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陽敏(2003). WTO與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N]. 中國經濟導報,2003,5,13.
- 朱學勤(1999). 從「五月花」到「哈佛」[J]. 東方文化週刊, 1999(16) <http://www.nfcmag.com /2002-06-2/article/53.htm>.

## 註釋

- 1 另說：蔡騏、孫有中（2000：154-169）「哈佛一半財產約780英鎊和320卷圖書」。

王成軍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2006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